

中篇小说集

历史将证明

柯云路 雪珂

山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将证明

柯云路 雪珂



山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将证明

柯云路 雪珂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14 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册

*

书号: 10088·864 定价: 1.00元

目 录

历史将证明..... (1)

收发室里的笑声 (115)

耿耿难眠 (195)



历史将证明

正当S省省委第一书记方志远率领的考察团即将结束在欧美为期两个月的考察时，S省省城发生的《时代的悲歌》事件，不仅在全国文艺界、思想界、政治界引起波动，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反响。

著名的欧洲《每日新闻》专栏作家萨林特——他也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在同中国考察团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之后，同方志远有一段坦率的谈话。

萨林特：“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六十多年以来，共产主义政权从未能较长时期地保持同知识分子的和睦合作。斯大林没有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后来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当今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没能够做到这一点。历史将证明，知识分子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存在的矛盾，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无法解决的。”

方志远：“按照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客观事实我们是坦率承认的。不承认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

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科学地分析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利益、情绪、要求和作用，制定一整套正确的政策，使知识分子能在各个领域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您是历史学家，一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六十多年前胜利的十月革命、三十年前胜利的中国革命，在其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中都吸引和聚集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革命的胜利不是偶然的，吸引和聚集起那个时代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偶然的。我是想说，在中国，惟有共产党这支政治力量，才能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使社会主义中国走向繁荣和富强。我们正是凭借这一点，凭借我们在这一点上的全部正确工作来实现对广大知识分子的领导、吸引和感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走过各种弯路，但历史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可能而且一定能够解决存在的问题！”

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者的权威靠什么建立呢？难道只靠权柄在手吗？

铺着猩红色地毯的省委会议厅内，气氛沉闷而紧张。

“同志们可以畅所欲言嘛。方书记刚从国外回来，连夜看了剧本，当即指示召开这样一个大型座谈会，就是想把各路好汉请来，请大家敞开谈谈自己内心的想法，谈谈对路野同志的《时代的悲歌》的看法，谈谈对省委宣传部处理这个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总之，要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这是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武光的第三次开场白。他试图再一次打破冷场的僵局。说到这里，他稍停顿住，笑着看了看大家，用商量的口吻说：“哪个开头啊？万事开头难，头一个谈，很光荣嘛！”他看看坐在身旁的另几位副部长，自己呵呵地笑了：“看，搞宣传的、搞文艺的坐在一块儿开哑巴会，这可有问题罗！”

其实，武光这一切言谈，只是说明他做为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善于用这种和蔼、从容的态度来缓和严重对立的僵持局面。眼前围坐在一排排沙发上的一百多人的冷场意味着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了。

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省文联各协会、各文艺刊物编辑部、各文艺团体、报社、电台和曙光大学的负责人及部分代表。他们，不是路野的坚决支持者，就是路野的坚决反对者。两个月来，围绕“《悲歌》事件”展开的广泛、尖锐的冲突，就集中反映在这些代表人物的身上。

两个月前，路野的话剧《时代的悲歌》由他的妻子——省话剧团导演舒华导演首次内部演出，请省委宣传部领导及文艺界人士审看。这部话剧原名《诗人在黎明前死去》，它描写的是一位归国诗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悲惨遭遇。由于它“用含蓄而宏大的手法强烈抨击了个人迷信”（某评论员文章语），立刻在这次内部演出后引起强烈的反响。文艺界不少人把它赞誉为“划时代”的作品，可以和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媲美。而宣传部的几位领导却从中看到了“严重问题”，认为：此剧必须作大的修改，否则不宜公演。文艺界的一部分同志对这个决定强烈表示异议，从作者到导演到剧团一致坚持不作修改，文联及一些文艺团体给省委宣传部来信，认为此剧很好！文联，省文艺月刊编辑部还送来了许多观众和读者来信——他们有的是看

了内部演出，有的是读到了剧本——也是支持此剧的。于是省委宣传部作出退让，同意修改一两句台词后公演。

公演以后，反响更大，全国许多剧团都写信或派人来要本子。但是，对它的批判也第一次在舆论中露出严峻锋芒。省报总编辑梁锋亲自发了署名批判文章：《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时代悲歌”？》，紧接着，省报又发了一组措词尖锐的观众来信。省党校的一些干部学员向省委写报告，认为这是一株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毒草。有一个在政法部门工作的年轻党员，甚至还把《悲歌》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报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查处。

省委宣传部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更坚定了自己最初对《悲歌》的看法。于是，经过研究，形成了新的决定：停演；批判；作者检查。

戏停演了，批判也开始了，但作者坚决不作检查。文联党组的汇报一个接一个：文艺界很是不满；作家们情绪低沉；许多人放下了笔；三分之二的人对省委宣传部的决定“不理解”；各文艺刊物的来稿量也急剧下降；支持路野的读者来信越来越多；在“供批判参考”的名义下，省城一些单位半公开地演出了《悲歌》；曙光大学还出现了各种方式的对路野的声援……

今天的会议，把这样一场波及全国的冲突一下子集中到一个如此有限的空间里，每一立方厘米的空气中浓缩的矛盾似乎都能迸出一道闪电！

路野作为省文联副主席也出席了会议，阴着脸坐在对面第二排的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冰冷的沉默对子一个热情健谈的人来讲，是对立情绪最强烈的表现。斜对面，在右边第一排沙发上，凛然端坐着仪表堂堂的省报总编辑梁锋。这位对《悲歌》进行批判的发动者，神情严肃、目光炯炯，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

摆稿纸，不时在上面奋笔疾书几个字。他那镇静、坚决的神情分明是随时准备发言，对路野进行批判。

武光的日光落到他身上，刚想笑着说“梁锋同志开个头吧”但马上意识到不合适，又把刚刚漾出的微笑投向路野，想再一次让他先谈。但是，路野对他投去的目光没有任何迎视和呼应，他那低垂的眼睑象一对冷冷的盾牌，那坚定沉默的神情分明是告诉别人：任何一个想动员他讲话的人都将碰钉子。

这时候，武光才意识到，这种冷场对他无疑是种压力。宽大的玻璃窗把足够的阳光投了进来，会场内部却好象笼罩着一层斑斑驳驳的阴影。

冷场——加剧了紧张的气氛，但冷场并不只是因为气氛的紧张。大家都不发言，是因为谁也不愿意现在发言。大家都在等待一个什么时刻，都在不断地把目光投向那被服务员一次次推开的朱红色会议厅门。人们显然是在等待一个什么人物的到来。于是，宣传部副部长武光这才想起了自己一开始讲的一句话：

“今天的会，等会儿，方书记可能还要抽空听听。”

终于，省委书记方志远来了。他是和一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推门进来的。他那浓黑剑眉下闪射出来的坚毅沉着的日光，他那满面春风的微笑，他那一坐下来就谈笑风生的乐观情绪，立刻感染了所有到会的人。他是那种有着强有力的生气勃勃性格力量的人。听说一直冷着场，他仰身笑了。那是一种愉快，奔放的爽朗笑声。

“舒华同志——”他收住笑声，敏锐的目光很快在人群中搜寻到路野的妻子——这位省话剧团的导演正静悄悄地坐在路野的身后，“你是导演，你不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话剧场面吗？”方志远注视了一下舒华后，接着说下去：“老舍的《茶馆》，大幕

一开是个闹哄哄的茶馆，戏剧效果很强烈。假如你设计一场戏，大幕一开是个坐满人的会场——一个鸦雀无声的会场，主持会议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动员大家发言，大家却端坐不动，悄然无语，这一定会给观众很强烈的印象，产生极有吸引力的悬念——‘这是怎么了？！’……这个场面人一定得多，而且要一动不动！会议主持人的唠叨一停就满台无声无息！许多人的静止不动，许多人的绝对沉默——这本身就有特殊的戏剧效果……”方志远兴致勃勃地讲着自己的设想，打着手势，好象眼前只是任由他调度的一台演员。

会议厅内许多阴翳的眼睛开始亮了。舒华和话剧团的其他几位导演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省委书记，导演的本能告诉他们：一出精彩的“话剧”正在这里演出。

“开会是个好办法，”方志远随便谈笑着，他的话一下子又转到别处了，“这里有没有搞理论的？梁锋，你是研究过历史唯物论的，你想过没有，开会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创造，也许早在原始社会就开始有了，后来越发展形式越多样，功能越广泛。这里也有个历史的过程，值得研究。喂，同志们，我这不是开玩笑噢！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一切事物都不是天经地义、从来就有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你们在报刊上争论几篇三角恋爱的小说，都涉及到道德问题——”

在座的人都极有兴致地注视着话语不迭的省委书记。那是怎样一个曾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保持夫妻关系上的忠贞和稳定是共产主义道德；另一种观点则引用恩格斯的话，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因此而断言，真正爱了别人，就应该夫妻离婚。两种观点的文章我都看了——梁锋同志，你的文章大概是属于前一种观

点的吧——不过，我似乎还没看到一篇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争论的双方虽都引经据典，但丢掉了——一个讨论问题的基点，这即是：任何一种道德论本身，都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其实，在爱情和婚姻上，刚才说的两种道德观的争论，本身就不是偶然的。这里有一大篇历史唯物论的道理，梁锋同志，你的文章就没有阐述清这些道理，很有些牵强的噢。……就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言，任何一种道德观，如果首先不从历史上指出它的渊源、形成和阶段性，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

方志远这一段话耐人寻味。几位文艺刊物的编辑，还有梁锋都在低着头记录着。

“好，现在回到开会这个题目。大家想过没有，世界上要是取缔一切会议：政治局会、国务院会、生产会、政工会、打起仗来的军事会、外交的谈判会，总有上万种会吧，如果统统把它们取缔了，世界肯定要陷入瘫痪！你们信不信啊？”

省委书记这些充满哲理意味的海阔天空的谈话，吸引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就是开会，它在有些时候是个好办法。现在，我想知道大家对《时代的悲歌》都是什么看法，对宣传部三条决定都有什么意见，怎么办好？一个人一个人轮流谈，过于费事，看材料又太抽象。这样把你们召到一块儿议一议，争一争，各自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就什么都清楚了！今天各方面的负责人和代表性人物都请了来（武光插话：“今天到会的有些同志是方书记亲自点名要通知的”），我对文艺界的情况稍有了了解（武光插话：“我们全省几十种大小文艺报刊，方书记都看”）。没全看，大多是翻翻，有的看得稍微仔细些，当省委书记的要了解文艺动态嘛！另外有一点，也许同志们还没有意识

到，关心一下创作现状，也是我了解整个社会情况的一个媒介，因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应是敏锐的……好了，不扯远了，我们开始座谈吧，希望同志们开门见山，拿出艺术家的勇气和理论家的气魄来，省委将根据同志们的意见，进一步判明情况。好，舒华同志，你是不是先谈谈？”

舒华一怔。她刚才有些走神了。她在构思两场戏。一场戏，就如方志远说的那样设计，那可以刻画一个官僚主义的会议主持者。另一场戏更为独特：一个领导干部如何用一大段富有弹性的、独特感召力的讲话，打破一个陷入严重对立的沉默的僵局！整整一幕就是他一个人的一篇讲话，一个人的戏！整个会场的人和他之间也应该有某种情绪和气氛上的对立；先要有铺垫，当这个领导步入沉默的会场时，观众是担心的，——他面临的是一个看来无法打破的僵局！要塑造一个象方志远这样富有强大思想魅力、性格魅力的干部。一个人讲话讲整整一幕，一个人讲话把整个舞台讲得充满了戏，一个人的活力与许多人沉默的强烈对比，一个人在思想、语言上无比宏伟奔放的力量，这最独特的戏剧发展，最有气魄的舞台调度……对舒华太有刺激性了！

此刻，她已经回到眼前的现实中，省委书记的眼睛正带微笑地直视着她。她掠了一下短发，看了看整个会场，便开始发言：

“现在，当作家难……”她第一句话便带出了情绪。

“难，才更可贵嘛！”武光和藹地插话道，随后笑了。

“问题是有些‘难——’，到底应该不应该发生呢？！”舒华尖锐地回了一句。

会场很静。

“我们对省委宣传部的三点决定是不理解的，——干脆说，是不同意的！有些人的批判文章，”她瞥了一眼斜对面的梁锋，

“完全是打棍子！不过，有点似乎是明白无误的，再象一九五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一下子把人置于死地，是办不到的，我们也不怕！”她激动起来，有着淡淡雀斑的脸上微微显出潮红，话越说越快，而且出奇地勇敢：

“‘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悲剧？个人迷信难道不是悲剧？不应该揭露和抨击吗？！还要继续让这些悲剧重演吗？有人说《悲歌》的作者是自比屈原，”她看了一眼坐在前面的丈夫——两个月来他的头上添了一缕缕白发——想起他从年轻时就立下的“为人民写作”的抱负，想到他二十年来厄运累累的遭遇，想到他那一篇篇慷慨悲歌的作品，一种又凄楚、又悲愤、又自豪的情绪涌上她心头。做妻子的在为丈夫呼号：

“当屈原有什么不好？忧国忧民，为民而生，为民而死！作家就是要有作家的良心！是被人民抛弃呢，还是让权势者抛弃？作家的选择只能站在人民一边。在历史上，有些作品在作家活着的时候往往受到权势者的排斥，但他们死后，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被历史证明是不朽的著作。现在有些棍子先生，今天批判这，明天批判那，历史会证明的，他们连同那些批判文章将很快被社会所唾弃，留下来的恰恰是今天被他们批判过的那些作品！……”她激动地收住了话。会场很静。停了好一会儿，她看着方志远和武光说：“我们不愿意多谈这些，我们愿意向前看。我们只是诚恳希望省委宣传部能改变三条决定。”

会议厅内一片静寂。袅袅青烟在沉思中缕缕上升。舒华发自肺腑的讲话，无疑在一些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在另一些人心中则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感。一半人眼睛里露出钦佩的光亮，一半人眉心紧紧蹙起。而沉默使双方更清楚地感觉到了相互间明显的对立。

武光照例和藹地笑了笑，但显得有些勉强，只在脸上、嘴角闪一下便消失了。

梁锋脸上掠过的是一丝难以察觉的抽搐。他知道，舒华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对今天这个座谈会，他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斗争不可避免。

“我谈几句，”他的发言是论战式的，语调却尽量放得平静和缓，“关于路野同志的《悲歌》一剧，我的看法在几篇文章中公开谈过了。我不掩饰我的观点，也不改变我的观点。我认为这部话剧丑化、歪曲了毛主席，因而也必然地丑化、歪曲了我们的党，丑化、歪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尽管作家以爱国诗人屈原自居，但他的作品所持的立场却是相反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背弃！正象一个西藏农奴出身的青年作者来信所指出的，‘这部作品没有写出祖国的可爱，写出的是爱祖国的可悲，因为剧中所描绘的祖国一片黑暗，毫不可爱。’也正象一位解放军同志来信所诘问的，‘难道让我们的战士去为这样一个该诅咒的国家流血牺牲吗？’对于《悲歌》的详细评论我今天不重复了，我欢迎《悲歌》的作者及其他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我现在想针对舒华同志刚才的发言讲几句。我认为她刚才的发言是带纲领性的，——当然不是指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纲领，而是说它在思想上、在代表路野同志的观点上带纲领性的。”他很庄严地停了一下，看了看会场，然后持重地，有分量、有停顿地继续往下说。他声音的洪亮、雄浑，他讲话的条理、逻辑，他仪表的严正、堂皇，都使人联想到中央台的著名广播员在广播社论：

“这个纲领概括起来就是：第一，毛泽东同志只有个人迷信，而没有任何功绩；第二，个人迷信是一切灾难之源；第三，所谓人民和权势者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不

要党的领导；第四，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同两千年前的屈原处境一样，这就等于说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同两千年前的楚国一样黑暗；第五，《悲歌》的作者就是屈原，他代表了人民。这五点就是作者的思想纲领。有这样的思想纲领，产生《悲歌》这样的作品是毫不奇怪的。因之，我认为《悲歌》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对它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省委宣传部的三条决定无疑也是正确的！”

梁锋雄辩有力的讲话在会议厅内回荡着，它形成的一种压力，简直使一些人透不过气来。路野垂着眼，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变得更为阴沉，嘴角因为愤怒而微微抖动着。舒华在笔记本上迅速记着梁锋的观点。坐在梁锋旁边的一个干部起身往梁锋的茶杯里倒水，梁锋致谢地点点头。

“未开会之前，文艺界有一种舆论，说方书记回来了，省委准备改变对《悲歌》的处理决定，”梁锋说到这里，眼睛直视着方志远和武光，整个会场的人对他这句话也都有敏感的反应，

“我认为这是谣言！我们相信省委这次是不会有在某种压力下再放弃原则的！”梁锋颇自信地将话说完。

武光听到这里，微微垂下了眼睑，梁锋这后一句话的锋芒显然是针对他的。两个月前，宣传部就曾在来自文艺界和社会的压力下放弃了最初的意见，同意了《悲歌》的公演。

整个会场的人都将视线移向了省委书记。几天来的各种猜测、各种传闻，现在都可以从省委书记哪怕最细微的一个表情上得到验证。省委书记到底是什么态度？

“大家接着谈吧，都发发言——每一个人。有争论更好。”方志远笑着说，并不马上表态，或者对眼前的会议作什么“引导”。他首先想看到的，是矛盾在毫无干预的情况下能充分展

开，乃至看到整个冲突的真实面貌。他炯炯的目光集在梁锋身上，等待对方继续讲下去。

省委书记心里非常清楚，舒华和梁锋的先后发言，都是迫使省委尽快表态，这自然是一种压力，也许施加者并不完全自觉。领导机构在制定政策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是正常的——而且只有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才能避免片面性；但如果在压力下，政策发生忽“左”忽右的摆动，则是可悲的。他联想到许多事，不由得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这方面的事委实太多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得准点儿、吃得透点儿、判断成熟点儿再下决心呢？

许多人开始相继发言。对立的观点一旦展开激烈争论，反倒显得自然。持不同观点的两派壁垒分明，甚至在“地理”位置上大致体现出来了：路野的支持者们以路野为中心坐成了一形，而梁锋的支持者们则以梁锋为中心坐成了相对的一形。这自然是人们踏进会场时就不自觉地形成的区域划分。当一形阵营和一形阵营间争论的硝烟正在弥漫时，方志远想到的却是：眼前的划分恰恰和整个社会上的分野相一致。

在激烈的辩论中，舒华和梁锋又都做了多次发言。舒华最后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梁锋说道：“难道，你就代表历史吗？！”

省委宣传部的两个年轻干事头也不抬地飞快地记着。记录纸一页又一页地翻过，把一切都忠实地化为了只有人类才有的符号。如果我们能在事后看到他们整理的《纪要》的话，眼前这场以舒华、梁锋为主要发言人的辩论，就是这样简明扼要地展开的：

舒华：有的人就是反对批判个人迷信！

梁锋：没有人反对批判个人迷信。但是，你们是在批判个人迷信的幌子下，歪曲和丑化毛主席！（激动地）毛主席的伟大历

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抹煞不掉的！

舒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抹煞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只是想同时说一句，对他的个人迷信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梁锋：你们把三十年来的新中国写得一片漆黑，就象外国报刊所说的：“作者形象地说明了三十年来政治如何扼杀了文化。在中国，诗人是不幸的！”

舒华：《悲歌》是以“文化大革命”十年为历史背景的。你能否定这一点吗？外国人如何评论与我们无关。

梁锋：你刚才还讲到在权势者和人民的对立之间要站在人民一边。请问：权势者的概念是什么？是不是在影射党？是不是要把党和人民摆在对立的位置？

舒华：权势者完全有可能以党自居，但绝不等于，也根本不能代表党。《悲歌》中写的和人民对立的权势者，指的是林彪、“四人帮”这样的代表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官僚！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梁锋：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年两年中，你们在许多场合反复宣扬这种观点，难道只是针对“四人帮”吗？

舒华（被激怒了）：是的！我们的确还有所指！林彪、“四人帮”是垮台了，难道他们得以产生的土壤也一起消失了吗？现在就没有和人民对立的权势者了吗？两个月来，在重重压力下，我们收到了一千多封群众来信，对我们表示了热情的支持——这一边就是人民！我们感谢人民！……而另一边，至今还在千方百计地整我们，必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之中有的人——虽然是极少数——就是与人民对立的权势者！在这二者之间，我们选择谁呢？我们只能站在人民一边！